



爱就要大胆说出来

——看电影《我爱你》有感

□唐雅冰

当青春随风流逝,当皱纹爬满额头,当烟火日子中柴米油盐酱醋茶成为每日思考的主题,当看尽冷暖磕绊多年,生活中还会有爱情吗?端午档电影《我爱你》作出了诠释。

电影讲了三对老人的黄昏恋。空巢老人常为戒和拾废品的孤寡老太李慧茹不打不相识,慢慢互生情愫;靠收荒货为生的谢定山与身患绝症且老年痴呆的妻子赵欢欣的相守及最终选择共赴黄泉;相思成魔的陈校长与仇老师彼此痴痴的等候。六位老人,三对爱人,在迟暮之年,纯粹而努力地相爱,相互取暖,简单的“我爱你”三个字是比任何海誓山盟都沉重的承诺,却触及到了非常现实的亲情、爱情、孝道等社会问题。

被孙女一语戳中肋骨的讨好型人格的老常,表面看豪爽开朗,甚至有一些时髦,游戏玩得比年轻人还熟,鞭子挥得溜圆,却一直生活在妻子过早离开的阴影中,为自己未能及早发现妻子的病而自责。好打抱不平的他在公园偶遇侵占公共场所堆放废品并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的李慧茹,凛然正气地大声教训了众人,并三鞭赶走聚集的人,也与慧茹结下梁子,开始了与慧茹的相爱相杀。慧茹举报他酒后驾车,他举报慧茹在消防通道堆放物品,没想到举目无亲的慧茹将电话打给了他,举报人变成了担保人,他也就此一步步知道了慧茹生活的不易,平静的心再起浪潮。老常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他爱上慧茹,心甘情愿为她运送废品去卖,甚至放下身子加入拾荒者

行列,最后为爱追到慧茹所在的乡下,终于讨好了自己一回,尊重内心,在青山绿水间比心说出“我爱你”三个字。

靠收荒货为生的谢定山与身患绝症且老年痴呆的妻子赵欢欣的爱悲壮而让人唏嘘。他们患难与共,生儿育女,相知相守,儿孙满堂,儿女们事业有成,本应颐养天年,尽享天伦之乐,赵欢欣的不治之症却把二人推至痛苦不堪的边缘。谢定山爱妻子,爱得热烈而深沉,虽然妻子已经认不出他,一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饮食起居都必须他亲自伺候,他却咬紧牙关,一面售卖废品,一面悉心照料着妻子,只要有妻子在身边就一切都安好。不愿看着妻子遭受病痛折磨,这个坚如磐石的男人认认真真筹备了一场家宴,之后如大象寻找死亡归宿一样,与妻子共同服下安眠药,安安静静地手牵手躺在床上,制造了煤气中毒的假象。他们走得那样平静,那样义无反顾,用最悲壮的方式践行了“生同床死同眠”的诺言。能与心爱的人共枕长眠,是他们的选择与归宿,也算他们生命的最终圆满吧。

陈校长与仇老师的爱情属于一个时代悲剧的殉葬品。本郎才女貌让人钦羡的一对,却被一段历史棒打鸳鸯,从而两人都变得不够正常,一人天天推着木头人散步,沉浸在与爱人相偎相伴的幻觉中;一人守着一扇假窗,把自己像鸟儿一样困在一间小屋之中,不愿与外界接触。这对爱而不得的人,为爱苦、为爱累,用最痴情的方式在情网中挣扎,好在最后终于团聚,一个恢复了记忆,一个再次亮开嗓子,爱情之花虽开

得晚,抛开世俗偏见倒也惊艳。

电影在讲三对老人的黄昏恋故事,却不完全在讲爱情,也在讲亲情与孝道。谢定山与赵欢欣含辛茹苦,儿孙满堂,可谓为了子女耗尽心血,费尽心思,到了生命的尽头还在努力想办法保全儿女的脸面。最后告别时,谢定山精心准备了一场家宴,邀请一大家人团聚,就在那难得的聚餐上,儿子忙着事业上的应酬;媳妇对老人为孙子们准备的玩具百般嫌弃,拿出酒精喷了又喷;孙子们在饭桌上捧着手机玩得昏天黑地……没有语言沟通,没有眼神交流,有的只是餐后儿孙们拍拍屁股抹抹嘴巴头也不回离开后留下的满屋狼藉。在无言的失望中,他最后一次把自己辛苦拾荒积攒的钱交给了一直遭受家庭暴力的小女儿……当两位老人服药永远离开这薄情的世界后,却出现另一幕场景,儿女们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葬礼上,儿子慷慨陈词,笑称父母没有病痛折磨,是喜丧。感到万分寒心的老常再次出手,狠狠挥鞭大闹丧礼,鞭打不孝子孙,鞭打冷漠亲情,鞭打众多看客……

电影《我爱你》在说六位老人黄昏恋的同时,也在呼唤人们关注特殊的老年群体,不光关注他们的冷暖,也关注他们内心的情感需求,爱,一直就是永恒的最温暖的话题。

“我爱你”,短短三个字,不光是花前月下的浪漫,还是为你遮风挡雨的责任,是相濡以沫的坚守。爱就要大胆说出来,不光对爱人,也包括对父母、子女、亲朋……

李佑伦的遗憾

□刘秀品

李佑伦遗憾什么呢?遗憾他写得最好的作品不是《人证》,而是《金有田》,可《金有田》至今都没有得到公正评价。这不能不使我这个局外人感到他的遗憾太离奇古怪,与大多数人的见解太背道而驰了。

为了证实李佑伦对《金有田》确实不应该存在遗憾,先将他的《人证》和《金有田》作个简单分析。

先说《人证》。故事的梗概是,一个只有半只脚掌的中年残疾人因为还没来得及办残疾证,临时买了一张儿童票乘火车,列车员和列车长都要只有半只脚掌的残疾人拿出证明来证明他是残疾人,如果拿不出残疾证,那就得补缴全票的钱。双方僵持,一位老者打抱不平站出来,要男列车长拿出证明来证明自己是男人,如果他拿不出证明,他就不是男人。而女列车员替列车长解围时,老者却说女列车员根本“不是人”,女列车员很恼怒,质问老者,“我怎么不是人?”老者的回答简单而有力:“把你的‘人’证拿出来看一下!”天下哪里需要证明自己是人的“人”证?哪里又办这样的“人”证?

再说《金有田》。故事的梗概是,爸爸给他取名金有财,妈妈给他取名金有富,爷爷说,“有田就有财,有地就能富”,给他取名“金有田”。这位“有田”兄确实爱田如命,惜地如金。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曾将一泡尿憋好几里路,憋到亲戚的承包地去撒,闹出浇死亲戚家“青苗”的笑话。可就是这个金有田,在农村吃大锅饭的年月偷懒耍滑,借故撒尿躲在背风处睡大觉,生产队长问他撒泡尿哪需要那样久?狠狠地怼了他一顿。

《人证》发表在2005年小小小说月刊,这个1300来字的短篇后被全国多家报刊转载,可以算是李佑伦的成名作。而1500余字的《金有田》至今都没有被哪个出版部门相中,仍待嫁闺中(或者可以说是“胎死腹中”)。一篇稿件能不能公开发表,无疑有

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人证》公开发表了,而且被多家报刊转载,不能说只是《人证》撞了大运,更不能说转载《人证》的那些报刊编辑的眼睛全都不好用吧?在下仔细地研读了《人证》和《金有田》后,不带一点偏见地说,《人证》确实比《金有田》写得好。虽然《金有田》以微小的篇幅概括了农村几个时代的变迁,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珍惜,表达了全社会对粮食问题的担忧,但“主题先行”的痕迹相当明显,文字略显粗疏,而《人证》主题充满正能量,故事结构巧妙、语言机敏灵动、情节转换自然,比《金有田》要高好几个层次。

由李佑伦的遗憾使我不得想到了“钓鱼心理”——有的鱼刚碰钩子就跑了;有的鱼头刚露出水面就脱钩了;有的鱼被钓出水面仍挣脱钩子逃走了。钓鱼者为此留下深深的遗憾:跑了的鱼是最大的,鱼篓里鱼再多,都是小鱼。李佑伦已钓到不少的“鱼”,篓子里也装了不少的“大鱼”,可他的心里,最大的“那条鱼”还在“水里”。

生活是创作的基石。李佑伦技校毕业,从四川先走上海,后下广东,干过汽车技工,当过搬运,做过保安,在流水线上操过手艺,在建筑工地上卖过苦力,最辛劳的时候,一天干十二个小时的体力活。颠沛流离二十多载,儿时浇铸在心底的作家梦却从未泯灭,只要能挤出时间,就泡图书馆、守售报亭,借着出租屋昏暗的灯光,用笔倾诉着心中的甜美和痛苦。他开始写小说,成为广东省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学打工仔”。从2015年开始,又改行专攻儿童文学,短短几年时间,就在小溪流、少年文艺、故事大王、少年时代报等报刊发表文稿百多篇,在儿童文学作家圈子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李佑伦虽在创作领域已露“尖尖角”,由于他从小生活在农村,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农民”。“偏见”源于“偏见”,由于他渴望田野始终长满绿油油的庄稼,期待大地永远以沉甸甸的果

实回报农民,因而始终把《金有田》视为自己“最乖的儿子”(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曾把作家的作品称为“精神的产儿”)。

由李佑伦的遗憾,让我想到了一个与文学创作相关的话题——编辑选稿的眼光和胸怀。

文学创作是极度个体化的劳动,作品主要是靠作家个人用心血酿造。文学作品要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得靠报刊(当然包括现在的融媒体)编辑独具慧眼。虽然一篇稿件的“出笼”要经过编辑部二审三审,但编辑的第一关最为重要。稿件到了编辑手里,如果编辑连看都不看,就被扔进了纸篓里,稿件写得再好,还不是三加二减五——等于圈圈!不少老作者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市场”很怀念,觉得那时投稿不讲门第、不设门槛,只要写得好就能发表、出版。不可否认,现在发表文章可是越来越难了,有的甚至说,“编辑部没熟人就莫想登稿!”

如果用“只有熟人才能登稿”的心态来看待今天的“文学市场”肯定偏颇。现在写稿的人何其多,千千万万的人都想通过发表文章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甚至证明自己的才能和优秀,用“编辑部一天收到稿件用麻袋装”来形容撰稿人之多一点都不为过。但编辑部收到稿件多是一回事,编辑秉公处理来稿是另一回事。有没有个别编辑不拿一把尺子量稿,良知没有放在应该放的位置,选用稿件掺杂了个人的欲念,而导致作者心目中“最大的鱼”跑了呢?作为“为他人做嫁妆”的编辑,是不是应该多想想,怎么让李佑伦们的内心少留下“跑了的鱼都是大鱼”的遗憾呢?

李佑伦的偏见和遗憾虽不可取,但很可爱。有了这种遗憾,他就会奋斗不懈,咬着牙巴骨不停地“抛钓竿”,在文学创作路上继续前行。说心里话,我作为一个在文学疆场上艰难跋涉了近60年的“老不中用者”,真诚为李佑伦的这种遗憾点一个小小的赞。